



## 解放军入城纪律—— 送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

□ 郑学富

1949年4月22日深夜11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第二十军解放丹阳县城。此后,总前委、华东局、华东军区机关和接管上海的干部陆续来到丹阳城。陈毅、邓小平住进丹阳县的戴家花园。他们在这里筹划指挥上海战役,开展整训,做好接收上海的准备工作。丹阳这座江南小城一下子热闹起来。

丹阳是京沪线上一座不大的城市,当时全县人口45万人,城区人口3万人。陈毅之所以选择丹阳作为解放上海的指挥中枢和接收上海的整训基地,原因有二:一是1938年夏天,陈毅率领新四军第一支队开辟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在丹阳一带开展游击战,抗击日伪军,与丹阳人民结下了深厚的鱼水之情,这里的群众基础好;二是丹阳地处沪宁线上,大运河贯通全境,水陆交通方便,有利于向前推进。并且这里地理位置适中,目标不大,部队集散迅速,有利防空。

陈毅刚到丹阳,开展深入调查,发现了违反纪律的事。5月10日,华东军区召开直属机关干部大会,开展整顿动员,陈毅作了专题报告。他在报告中列举了违反纪律的几个事件,进一步强调入城纪律。他说:“上海是个现代化的城市,是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窝巢,是百年来发展起来的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复杂的城市,我们没有经验是很难进行工作的。因此除了具有信心以外,必须要有谨慎小心、‘临事而惧’的态度,这样才能多考虑问题,否则是低级的幼稚的,就一定会栽跟斗。”关于执行入城纪律,他语重心长地说:“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开始,是和市民的见面礼。纪律搞得不好,政策就可以搞得不好,搞不好就会影响政策的推行。上海人民对我们的希望很大,把我们看成‘圣人’,如果一进去就搞乱了,他们就大失所望,再挽回影响就要费很大的劲。”他要求“入城时要尽量做到部队不进城,全部驻扎郊外,先派接收干部,经过专门训练的武装进城,初步清查接收,分配好房子,然后依次进城。马匹、大车一概不准入城。”

二

丹阳整训期间,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总前委、华东局围绕接管上海,开展了一系列的集中培训教育活动,认真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从

思想上解决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到城市的问题。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城市政策汇编》等入城纪律、城市管理、统战政策等方面的政策规定。尤其是在入城政策和纪律上,做了严格要求。5月14日,华东军区发出训令,指出军区各机关部队自南进以来,军纪风纪较为松懈,进驻丹阳城后在群众中造成极不良影响,并作出了一系列的制度规定。为保证制度规定的彻底执行,除授权各岗哨卫兵检查外,军区本部特组织了军风纪检查队,随时进行沿街检查。第三野战军颁发了《“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的命令》。华东局颁布《入城纪律十二条》,下发到连,要求一切部队、一切接管机关“在入城前,必须普遍地、反复地、深入地”进行教育。



解放军进入上海后,严守纪律,不入民房,在街边露宿。

当时的解放军战士们,都将《入城纪律》贴在背包上,后一个人看前一个人的,天天背诵。还将《第三野战军入城守则和纪律》编成通俗易懂、容易传唱记忆的歌谣,如“房子不能随便住,宿营必须听指定。不准乱跑乱游逛,先要请假后出门。不准随便乱打枪,军纪禁严不容情。不准沿路拦汽车,走路要靠一边行。”“八条守则讲分明,看谁条条记得清?全军上下无例外,都要自觉来执行。干部自动带头干,检查督促要抓紧。同志互相来监督,共同为党负责任。谁敢故意来侵犯,铁的纪律不留情。首先把他赶出城,轻则检讨重处分。用心研究和学习,遵纪立功为人民。秋毫无犯纪律明,革命胜利有保证。”由于采取以上措施,在入城之前较大幅度地提高了每一名士兵尤其是军政干部的纪律意识,把好纪律关口,使部队纪律大

大加强,军风军纪明显改观。

总前委在丹阳共停留了23天。完成了思想、组织、物资等方面的准备工作,来自总前委、华东局、华东军区的3万多名干部在这里接受了培训。5月25日深夜,陈毅离开丹阳进驻南翔镇。26日,邓小平率总前委、华东局机关和接收人员告别丹阳,乘火车向上海进发。

三

上海战役历时16天,5月27日上海完全解放,实现了军政全胜。在枪声停息后的第一个清晨,当市民们打开家门时,惊奇地发现马路两边湿漉漉的地上,睡满了身穿黄布军装的解放军战士。上海市民自发地拿来烟、糖、饼干等慰劳解放军战士,但是都被婉言谢绝了。当时有个战士写了一首打油诗:“想上海,进上海,进了上海得到两条麻布袋,又是铺,又是盖,晚上睡觉怪凉快!”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在5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解放军之来,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

《人民日报》1949年5月31日报道说,人民解放军在上海的优良纪律,获得了上海人民的普遍赞扬。在5月25日解放军刚进入市区时,除了执行看管敌伪机关的少数部队外,其余的部队都在马路旁休息和露宿。即使是军部、师部等指挥机关也没有例外。纵横几十里的繁华市区内没有一个人私入民房的。这些几天几夜没有休眠的战士们,有秩序地排列在马路边的人行道上,许多人与围聚到眼前的市民亲密交谈,有时就齐声高唱歌曲。解放军战士们谢绝了热情的居民们送来的茶水,吃着已从三四十里以外的市郊送来的饭菜。从早到晚,担筐送饭的解放军炊事员们不绝于途。在这个国际大都市这是从未见过的奇景。各部队的马匹都存放市外,以免妨碍市区的交通和公共卫生。虽然所有的商店都立即营业,但因为人民币和伪金圆券兑换的比值当时尚未规定,没有一个战士去买东西的。解放军的严明纪律和对人民的态度和蔼,连早已听说的市民都感到惊异。到处可以听到市民们的称赞和颂扬。在上海市郊的解放军在战斗中抽空复收,在月浦作战的某部因战地居民大多出外躲避战火,而田里麦子早已熟透,于是该部立即帮助留下的农民收割。许多农民称赞“这些战士们打仗活活都像老虎一样猛”。

192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当时,中共党员总数已由“四大”时期的3000多名,增至5.7万多名。虽党的战斗力明显增强,但有些党员在工作、斗争中不执行党的政策、不遵守党的纪律,违犯违纪现象屡有发生。健全党规党法、扼制违纪违规,保持党员队伍在政治、思想、行动上的高度一致,就成了摆在全党面前的重要任务。

“五大”代表,新中国首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回忆当时的形势说:“迫切需要成立党的监察机构,纯洁党的队伍,严格党的纪律。建立中央纪律检查机构,空前地加强党的纪律监督,是党发展到这一时期的必然选择。”

为此,在“五大”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机构:监察委员会,选出9名委员和候补委员,王荷波当选第一任监察委员会主席。

王荷波,福建福州人,192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组织、领导津浦铁路、南京浦镇等地工人大罢工,上海工人第二、第三次武装起义;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等,是第一位工人出身的中共中央委员;1924年5月,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莫斯科共产国际“五大”、赤色职工国际大会,在会上作“关于中国工人运动”的报告。

1927年5月上旬,王荷波主持召开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对当前和今后工作进行认真讨论和周密部署,大家一致认为:监察委员会要坚决履行“五大”赋予的“维护党的一致和权威”的职责,特别要深入落实中共中央1926年8月作出的《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各项规定,确保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维护党的政治影响和权威。

王荷波在讲话中强调:“目前,一些党员在行动上、思想上陷入无组织、无约束的混乱状态,党内存在着很严重的消极情绪、涣散现象、贪污行为,我们目前的工作重点是要严格党的政治纪律,对未能正确执行党的决议、在革命工作中失职的、有假公济私、贪污侵占行为的党员查实问责,按规定严肃处理。”

1927年5月下旬开始,在王荷波主持下,监察委员会对掌握的党员违纪违纪线索进行查实。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师党代表包惠僧,没有将部队整编情况向上级党组织报告,致使该部队发生叛乱;萧人鹄配合北伐军作战不力;永利乡农会干部私吞土豪财物;陈九鼎领导武装起义指挥不当等20多起失职、贪污、违规行为被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

当时,监察委员会接到举报:工农义勇军政治部主任王基永“叛变投敌”,有人建议给予王基永开除党籍处分。王荷波多次找与王基永熟悉的同志调查了解,得到的情况是:1927年5

## 中共第一任监察委员会主席 王荷波

□ 周铁钧

月,军阀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疯狂镇压共产党人,王基永遭悬赏追捕,他只得隐蔽,与党组织失联。说他“叛变投敌”并无真凭实据。

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王荷波并未同意草率处理,直到后来湖南省委查明:当时王基永隐藏在亲戚家,后来多方联系党组织未果,只得远赴甘肃礼县,继续开展革命斗争。王荷波在对待王基永的问题上,充分体现出他谨慎稳妥的办事原则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根据党的规定,监察委员会成员要前往各地开展巡视、监察工作,但当时正值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久,反动军阀疯狂拘捕、屠杀共产党人,各级党组织蒙受了巨大损失,9位监察委员有8位在白色恐怖中先后壮烈牺牲,无一人变节叛变。

1927年10月18日,王荷波被叛徒出卖逮捕,他坚贞不屈,11月11日英勇就义,时年45岁。

王荷波短暂的一生,全部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尤其在维护党的队伍纯洁和健康发展,严肃党纪党规,提高党的威信力和战斗力等方面,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光辉事迹和奋斗精神、不渝初心和坚定信仰,将永远被缅怀铭记,赓续传承,激励共产党人牢记使命、勇毅前行。

### 红色记忆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造币厂银圆钢模

□ 钟同福



苏区中央造币厂旧址——瑞金洋溪



国家一级文物——  
苏区中央造币厂仿造民国三年银圆的钢模



苏区中央造币厂使用过的冲锤

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里珍藏着一件珍贵的文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造币厂仿造民国三年银圆钢模。该文物是用来制造银圆的模具,由钢铸成,分成上下两部分,下部是四棱台底座,模座的下底长7.8厘米,下底宽5.8厘米,上底长6.3厘米,上底宽5.5厘米,高2.2厘米;钢模上部是边长为2.5厘米,高1.1厘米的正六棱台钢印模型,其上刻有一个直径为3.9厘米的圆,圆内阳刻袁世凯半身侧面光头像,头顶上部呈月牙形阴刻隶体“中华民国三年”六字。苏区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造币厂使用这个钢模铸造了大量俗称为“袁大头”的银圆。

当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统一发行了面值壹元、伍角、贰角、壹角、伍分的纸币和贰角银币,以及一分、伍分、贰角铜币在中央苏区流通,为什么还要铸造“袁大头”呢?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定都瑞金后,国民党一方面继续加大军事“围剿”的力度;另一方面对中央苏区实行了残酷的经济封锁,蒋介石甚至把经济封锁看得比军事围剿更重要,他曾这样训令:“将匪区严密封锁,是我们最重要的战略。以后对于匪区封锁的种种办法,一定要密切实行,这一点比和匪区作战还要重要。”在如此严密的经济封锁下,苏区内急需的药品、布匹、食盐等物资也无法进入中央苏区,几百万苏区军民的生活异常艰难,也严重影响反“围剿”的斗争。

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积极发展对外贸易,派出人员到白区去采购苏区急需物资,然后采取多种方法,冲破敌人的封锁线送到苏区,以满足广大苏区军民的需求,而进行对外贸易就需要大量能在白区流通的银圆。因此,筹集银圆成为了一件关系国计民生以及反“围剿”斗争的大事,苏区中央造币厂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据史料记载,苏区的造币厂,最初是由兴国县东

村乡几家银匠在1929年开始创办的。1930年10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接管了该厂,改名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造币厂,工人增加到20多人,原料也很充足,平均每天能造出银元500余枚,品种既有“袁大头”,也有“小头洋”“老鹰边”。1931年冬,造币厂负责人谢里仁奉中央政府的指示,带着十余个原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造币厂的铸币师傅一起来到瑞金叶坪洋溪村,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造币厂迁往瑞金,成立中央造币厂,由苏维埃国家银行直接领导。厂长谢里仁,后为陈祥生、杨其鑫,下设行政、业务两处,行政处设有文书、会计、出纳等;业务处下设熔银部、纹皮部、冲床部、滚边部、洗银部、印花部、包装部、修理部和一个银库,全厂干部职工170余人。

中央造币厂建厂初期采用的是手工铸币,因为方式非常原始,工人每次铸造银元都非常吃力,个个干得气喘吁吁。开始时,造币厂手工造币大致操作程序是:炭炉把银子熔化再把银水倒进石板做的模具里,铸成长条形的银看块,然后把银块纹压,剪成与银元差不多大小的银坯,放在钢模里,最后冲压成型。冲压的工具是一块两百多斤重的条石,没有冲床,用木头做起重架,用麻绳吊起条石,把刻有图案的钢模夹住银坯,突然放下条石,靠条石的惯性把银坯压成银元。由于条石冲压时力量不均匀,着力点不准,所以造出的银元很粗糙,边缘也没有花纹,要用砂打磨出光亮来。如此繁琐的工序制造银元,一个环节没有做好,就要拿去回炉,既耗人工又浪费木炭。

1932年3月27日,红军在福建上杭县地区,攻克了敌军钟绍奎的匪巢,缴获了钟绍奎的一套铸币机和钢模,并很快地运送到中央造币厂。这台铸币机是铸造毫洋的,中央造币厂的工人师傅将这台机器进行改装,并精心刻了这件“袁大头”的钢模。这样,中央造币厂开始半机械化生产“袁大头”等能在白区流通的银圆。据谢里仁回忆,产量最高时每天能生产银圆

一万余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使用这件钢模制作出来的银圆,与真银圆相差无几,而且银纯秤足,在白区购买了大量苏区急需的药品、布匹和食盐,保证了对外贸易的需要,有力地缓解了中央苏区和红军现金短缺、经济困难的不利局面。

1933年夏,中央造币厂的铸币机由于负荷太重,机器坏了。恰好这个时候,白区的商人,已认出中央造币厂制造的“袁大头”银元是苏区制造的,因而不用苏区的银元了,严重地影响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央政府指示中央对外贸易总局尽快从白区购进铸币机械。江口外贸分局接到任务后,通过赣商商人,很快从上海买回一台铸“老鹰边”的机器,还购回了一批供制造钢模的“马金钢”。1933年冬,红军又在福建沙县缴获了一套铸造银豪子的设备,运回造币厂,至此,能在白区流通的“老鹰边”源源不断地被铸造出来,这件“袁大头”钢模退出了生产领域。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长征,中央造币厂留在苏区,但停止了造币生产。厂长谢里仁将工人组织成运输队,由国家政治保卫队1个连护送,将造币厂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运输到于都县高陂龙山村。正准备开机铸币,敌人向造币厂所在地区发起总攻。根据中央政府办事处的指示,工人们在附近山区埋藏好机器设备,一部人员编入红军独立第二十四师参加游击战争,一部分人员疏散回家。造币厂的几十担银坯,由国家政治保卫队护送,随着中央政府办事处转移,后被秘密埋藏在于都县上坪、屏坑一带山区。

80多年过去了,这件中央造币厂仿造民国三年银圆钢模,作为当年中国共产党领导苏区人民在经济领域上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特殊的战斗的见证物,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1994年,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到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进行文物鉴定,专家们一致认定该文物是珍品,将其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